

*Unbounded Loyalty: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.* By NAOMI STANDEN. 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'i Press, 2007. xiii, 279pp.

《無疆之忠：越境於遼》（*Unbounded Loyalty: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*）一書以十世紀為主要關注時期，把「忠誠」的含義在不同歷史時段的變化作為主要分析框架，通過闡釋幾個由中原王朝跨越邊境至遼，並服務於遼的個案，展示了從唐末到宋初這一動盪時局下，政權之間、個人之間的關係，以及他們對歷史走勢的影響。更通過揭示邊界變得越來越清晰、越來越難以逾越這一趨勢，展現出整個秩序格局發生的巨變。該書視角新穎，且集中討論歐美學界研究較少的五代時期，具有相當的價值。

全書除緒論、結語和附錄外，分為兩部份。第一部份「邊境、邊界與穿越邊疆的人：概念與背景」，與第二部份「服務於遼：個案故事」，各分為三章。緒論主要點明了該書與以往研究採取不同立場。以往對於此時段的研究基本都從中國的視角出發，而該書則不把五代看作「漢」，不把遼看作「戎狄」，而是以一個平等的視角進行研究。同時把五代時期當作一個獨立存在的整體，既不是唐朝的尾聲，也不是宋朝的預備階段。

第一部份的三章集中探討了所採用的研究框架、重要概念的定義，並對時代背景進行了梳理。第一章〈你無法從這裡到那裡：框架的反思〉，審視了三個可供選擇的研究框架：邊界、種族、忠誠。作者指出，把邊界看作研究框架的問題在於，在十世紀的大部份時間，邊界是變動的，且對於人們的意義，並不及實際的管理權掌握在誰手中那麼重要。而若把種族作為框架，則暗含了種族會影響人們的行為這一未被證明的前提假設。把忠誠作為框架，實際上也有問題，即到明清時期，忠誠的概念強調的是對某個政權的無盡的、不變的忠誠，與十世紀的情況不合。所以，該書雖然以「忠誠」作為研究的框架，但特別關注其在不同時段、不同史料中體現出的不同意涵。

第二章梳理了從先秦直到北宋時期，「忠」的意涵的變遷，以及影響其變化的時代背景。作者把「忠」分為兩大類，一類是「關聯式忠誠」（relational loyalty），一類是「理想式忠誠」（idealistic loyalty）。「關聯式忠誠」強調的是官員對統治者的責任，體現的是官員與統治者相互依存。而「理想式忠誠」則強調官員更高層次的考慮，如道德要求、文化方面的考慮，特別是「道」。此種意義上的忠誠，使得官員保持了相對於統治者的獨立性。作者又從「關聯式忠誠」提煉出兩方面，分別發展為「等級式忠誠」

( hierarchical loyalty ) 與「互惠式忠誠」( reciprocal loyalty )。前者強調忠誠不僅應對統治者個人，而是應對整個王朝，即使統治者更替，忠誠仍應保持；後者則認為，如果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而改變效忠對象，亦可被認為是忠誠的表現。作者在該書的第二部份中，主要借助這些概念進行個案分析。

第三章〈穿越邊境與改變邊界：第一代入遼的南人〉，梳理了整個十世紀遼與南方政權的關係，以及南方政權下的人到遼朝的原因，指出在不同時期，入遼的方式及原因所發生的變化，同時也點明了個人在決定邊界這一問題上角色與力量的變化。該章整理出了超過200例穿越邊境的個案，將穿越邊境的情況分作幾種：形成同盟、自願、脅迫，以及非自願。

第二部份的三章借助第一部份建構的分析框架與概念，對五名穿越邊境到遼朝服務的人的經歷進行了分析。選取的五個人分別是韓延徽、張礪、趙延壽、李澣和王繼忠。這五個人中，前四人所處的時期相近，曾經在遼共事。韓延徽最早到遼，隨後是張礪、趙延壽。李澣在947年遼攻打後晉之後被帶入遼，之前的三人都在遼南侵後北返的途中見過李澣。李澣和韓延徽隨後同在朝中任職。年齡上大概是韓延徽比張礪大十歲，張礪比趙延壽大十歲，李澣和趙延壽年齡相仿。而在澶淵之盟的簽訂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王繼忠，則與他們完全是不同時期的人。

第四章主要講述十世紀初韓延徽與張礪這一組個案。韓延徽在遼創立初期入遼，仿照中原的制度幫助遼規劃、建立制度。張礪則在相鄰兩國間穿梭。他們二人都不止一次更換過效忠的對象，但他們的行為在當時被認為很正常。第五章主要分析張礪與趙延壽這一組個案。他們二人正式入遼的時間均約為十世紀三十年代。張礪入遼後曾想逃歸南方，而趙延壽則領着遼軍對抗後晉。在這一時期，效忠於遼的吸引力與壓力都更為明顯，而已經變化的政治環境使他們的選擇與前一組個案相比，產生更多的問題。第六章分析的是李澣、王繼忠這組個案。李澣於947年被迫入遼，始終有反遼的表現，甚至保持着與南方的聯繫，策劃着分離屬遼的邊境地區。王繼忠則是在宋遼戰爭中被遼俘虜而入遼。他努力促成了給邊境帶來和平的澶淵之盟，但卻也因為澶淵之盟的訂立，無法再回到宋。在這一過程中，已經可以看到，忠誠的定義與邊界一起愈發清晰，而留給越境的人的選擇空間，則越來越少。

第二部份不單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探討忠誠含義的變化，同樣還從歷史書寫的角度進行了文本分析。作者在闡釋個案時，一直注意將不同史料中對於相同事件的記述進行對比，並將此視為同樣重要的考察忠誠含義變化的途徑。作者進行比對的幾種主要史料為《舊五代史》、《新五代史》、《資治

通鑑》、《契丹國志》、《遼史》與《宋史》。作者在第一章已經專門討論過這幾種史料的形成過程及彼此關係，故在第二部份中，直接通過對比發現的差異，即在不同史料中，強調了什麼，隱去了什麼，再結合史料的形成時間，論述在史料編纂的時代忠誠的含義。

全書的結語回顧了忠的含義在歷史進程與歷史編纂中發生的變化，同時闡發了對於疆域、身份認同、道德之間關係的理解。此外，還指出民族主義敘事對史料編纂以及重塑這段時期歷史的影響。書後附表涵括了225例從十世紀初到澶淵之盟簽訂這一時期的越境事例，既包括個人，也包括群體。表中包括了越境的人物、時間、地點、方式、種族、資料來源，以及一些特別的注釋，對於了解這段時期邊境地區的整體情況有很大幫助。

該書十分重視研究的方法，從研究框架的選擇、概念的界定、類型的劃分，以及史料的對比等方面，均可體會到作者的用心。而該書的突出貢獻，則是點明了十世紀的特殊性與重要性，揭示了十世紀發生的重大轉變。轉變發生在邊界的劃定、忠誠的含義以及歷史的書寫等方面，且相互關聯。十世紀初，政權之間的地理邊界並不清晰，重要的地方領袖更換效忠對象便會帶來邊界的變化，個人的忠誠可以決定邊界。此時忠誠的含義也比較寬泛，為人們提供了多種選擇。而「互惠式忠誠」在此時並不少見，且得到當時人的認同。到十世紀後期與11世紀初，情況則完全不同。邊界由於政權實力的增長與彼此關係的穩固而變得清晰，個人不再具有決定邊界的能力，反而是邊界決定個人的效忠對象。忠誠的含義變得狹窄，遼朝再也不是一個潛在的可以效忠的對象，忠誠也不再是領導者們競相追逐，低一級的官員們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奉上或者收回的一種商品。忠在此時僅僅意味着「等級式忠誠」。在整個過程中，我們可以看到忠誠的實踐如何推動了政治的發展。最初，效忠對象的選擇決定了邊界，並且有助於挑選出並加強那些更有實力的政權。之後，發生變化的忠誠的標準又幫助維護鞏固中央政權的權威，以及決定它們的邊界的位置。邊界與忠誠含義的變化，實際上揭示出秩序格局的變化。與此同時，同樣發生變化的還有歷史編纂的標準。除了忠誠的概念發生變化，對編纂時的褒貶、詳略產生的影響外，民族主義色彩在編纂中也愈發濃厚。十世紀初期的人們，對種族、文化認同等問題並不重視，從越境概況的統計數據中便可看出，種族因素在其中並不構成影響。而十世紀之後，伴隨着忠誠含義的固定化，種族身份、文化認同都被越來越多地強調，而這一趨勢也反映在歷史編纂上。

在該書的諸多優點、貢獻以外，仍有兩點值得留意。其一，該書雖然已

反覆強調，並不把地理疆域與地理邊界視為主要分析框架與關注對象，但由於全書的論述依然是圍繞邊境地區展開，對地理環境的情況與影響加以適當的論述，可使論證更加豐富與完整。其二，該書所利用的主要史料之一《契丹國志》，作者按照其為宋人葉隆禮所著加以分析和利用。不過事實上，《契丹國志》一書的情況比較複雜，劉浦江曾專門撰文指出，此書的作者和著作年份均出自杜撰，是一部書賈託名的偽書。雖然此書保留了一些他處不見的記載，仍具有相當的史料價值，但若將此書與其他資料對比進行歷史編纂的分析，則需格外慎重。

《無疆之忠：越境於遼》一書在開篇便指出，目前對於「唐宋變革」的研究，在時段上既有不連貫之處，亦忽視了遼的作用。而此書以獨特的視角、細密的論證，對這兩個研究薄弱之處，作了極大的推進。

李怡文

北京大學歷史學系

*Public Success, Private Sorrow: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arles Henry Brewitt-Taylor (1857-1938), China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Pioneer Translator.* By ISIDORE CYRIL CANNON. Hong Kong: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, 2009. xvii, 260pp.

肯西爾 (Isidore Cyril Cannon) 這部著作是關於布韋—泰勒 (Charles Henry Brewitt-Taylor) 的傳記。布韋—泰勒是自19世紀80年代起任職上海、天津、北京等地海關的英國人，亦是中國著名小說《三國演義》首部英譯本的譯者。萊特 (Stanley F. Wright) 的《赫德與中國海關》( *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* )，和費正清 (John K. Fairbank) 的《馬士：中國海關稅務司和歷史學家》( *H. B. Morse,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* )，基本上從制度史的角度分析外籍海關人員對晚清現代化的作用。本書則嘗試通過家族史和文化史的角度，形象地描述布韋—泰勒在中國公私生活的實況，並強調不少外籍人員在處理晚清時期外國壟斷貿易、內部動亂和現代化等問題時，是出於個人的選擇、對中國文化的熱愛，以及協助中國發展的願望。這打破了以往學界視外籍海關人員為帝國主義在華代理人的論斷。

作者在引言中談及本書的分析架構時，首先指出布韋—泰勒是一位很少